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儒商及文化与文学



陈书录 著



中华书局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儒商及文化与文学

陈书录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商及文化与文学/陈书录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5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101-05481-1

I. 儒… II. 陈… III. ①商业经营-中国-文集②商业
经济-文化-中国-文集③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F715-53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1449 号

书 名 儒商及文化与文学

著 者 陈书录

丛 书 名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8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481-1/I·756

定 价 38.00 元

本书为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美国亚洲区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资助项目

南京师范大学“211”建设工程子项目成果

目 录

前 言	1
一、儒商精神的复兴与中唐诗文革新	5
二、北宋诗文革新中“农商皆利”与“重农抑商”两种思潮	25
三、商贾精神与南宋陆游诗歌创作的新变	37
四、商贾的忏悔与元明文人的自赎	51
五、王阳明的儒商伦理及重商思想与明代中后期的雅俗文学	74
六、士商契合中转向俚俗与性灵	102
七、“弦高存郑”与“子贡全鲁”考异及其视野转换中的意义	117
八、儒商精神与明清性灵思潮的演变	134
九、区域民俗与《史记》中的人物性格	156
十、玄学与南朝家风及文风	186
十一、吴越文化与朝野文学之异同及其影响	206
十二、佛教文化与明代诗文中的禅境及禅趣	225
十三、科举及朝廷政策的导向与明代文人的价值取向	240
十四、哲学思想与徐渭的雅俗文学理论	258
十五、草野文化精神与古今文学演变	276

前 言

史家文苑接儒林，上下分明鉴古今。

一代词章配经术，不然何处觅元音。^①

在我国的传统的史学著作即二十四史中，文学与儒学、词章与学术等密不可分，进而言之，在我国传统的观念中文学与文化的结合是相当紧密的。其实，文学与文化的结合，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例如关于“文学”的界说，先秦时期是最为广义的文学概念，“文学”兼有“文章”与“博学”的两重意义。两汉时期，“文”与“学”分开，“文学”与“文章”分开，属于词章一类的作品称之“文”或“文章”；含有学术意义的作品称之为“学”或“学术”。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何尚之奉命立玄学馆，首次将玄学以单科性质与儒学、史学、文学并立，文学等具有更为独立的性质，并有所谓的文、笔之分，“文”指情感文学，美感文学，所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②；“笔”指理知文学、应用文学。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有坚持文学与文化融为一体的观点，例如南朝梁时的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中指出：“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

^①翁方纲《书空同集后十六首》其十二，《复初斋诗集》卷18，第512页，续修四库全书据清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②萧统撰，《文选序》，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页，中华书局，1977年。

也。”^①这种“文道合一”的观念，在中国文坛上相当长的时期都占主导地位，这势必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创作。显然，“文道合一”乃至文学与文化的结合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的史实。因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必然有文学与文化的结合，而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文化观照，既是贴近历史，又是更新视角的多方位观照。文学研究，一方面应该重视文学本体的研究，另一面也要重视对文学的文化观照。例如杨万里的七绝《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云：“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荷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②这是一首流传颇广的诗歌，还曾被选入中小学课文。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其中的“六月中”往往不加注，甚至有误解。例如《宋诗鉴赏辞典》中说：“诗人的原意是想说，满湖莲叶荷花的景色为六月所独具。但六月属夏，‘六月中’的风光只能与春秋冬三时有异，岂能与四时不同？不过这正如‘四季如春’的成语一样，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不可拘泥于字面。”^③其实，“六月中”不是说在六月之中，而是应该从古代四时节气的习俗上来理解。春夏秋冬四时有二十四节气，分别为十二个节气和十二个中气。从立春开始更替，每逢上半月的叫“节气”，逢下半月的叫“中气”。元代胡炳文《云峰集》中有一篇《二十四气论》，分别论一年四季中的十二个“节气”、十二个“中气”，其中有云：“六月节，小暑。六月中，大暑。”又云：“六月中，暑之极，故为大。”^④由此可见，“六月中”是指大暑期间，是一年四季中最为炎热的时期。在唐宋时代多有以“六月中”作为节气入诗的，例如唐代厉玄《送黄晔明府岳州湘阴赴任》诗中云：“恩霑谴雪几人同，归宰湘阴六月中。”^⑤北宋诗人赵抃《忆松溪三兄县尉》诗中云：“忆别扬州六月中，倏今三已换春冬。”^⑥与杨万里等同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陆游在《晓望海山》诗中写道：“向来六月中，黑云齐如截，苍龙下曳

①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第2页，中华书局，1983年。

②杨万里撰，《诚斋集》卷23，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

③《宋诗鉴赏辞典》，第108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

④胡炳文撰，《云峰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

⑤《全唐诗》卷516，第5898页，中华书局，1960年。

⑥赵抃撰，《清献集》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

尾,卷雨洒炎热。”^①显然,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中也是以“六月中”作为节气入诗,这不仅是强调“六月中”的西湖风光与春、秋、冬三季有异,而且还强调“六月中”(大暑)的西湖风光与夏季中的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等节气相比也有显著的不同。一句话,此诗的前两句旨在强调西湖“六月中”(大暑)的风光超奇之美。这是从节令习俗乃至文化的角度解决文学研究中难点的一个例证。

对文学的文化观照,既是贴近历史真实,又是开阔研究视野,可以从儒学、道家、玄学、道教、佛教、艺术、教育与科举制度、官制、民俗以及思维方式等多层面来观照文学,分别从哲学、经学、宗教学、历史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民俗学和文献学等多学科入手,攻克文学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开拓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在求实中创新。而在此中间,我们比较侧重于儒商精神与文学的交叉研究。所谓“儒商精神”,是指儒家思想与商贾精神的结合,其基本特征是“义以生利,利以平民”^②,孔子的弟子子贡是早期儒商的典型。显然,从狭义上来说,“儒商”是商贾与儒家仁义精神的结合;而从广义上来说,“儒商”是亦士亦商,或士而商、商而士,“儒商精神”往往又指儒士与商贾心灵的契合之处。因而,在儒商精神与文学的交叉研究中,我们注重探究士与商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士与商的互动对于文学创作与文理论批评的影响。同时,我们在深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史实中,清清楚楚的看到先秦两汉历史散文、唐宋诗文与传奇、元明清小说戏剧及诗文,包括“三言二拍”、《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型世言》、《蜃楼志》等中,活跃着许多寄托着作者审美理想的儒商或背离乃至败坏儒商精神的奸商形象,许多作家以艺术创造的成果大力张扬儒商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中一笔不可忽视的宝贵遗产。但是,西方有影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感叹说“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③,

^①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16,第12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②《左传·成公二年》载孔子言论:“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788页,中华书局,1990年。

^③[德国]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7页,三联书店,1987年。

并且忽视中国古、近代历史上存在着的儒家伦理与商贾精神结合的事实。因而,我们坚持考论结合,坚持历史文献与文学文本相结合,探微索隐,取精用宏,深入研究渗透着儒商精神的文学作品,进一步发掘相关文学作品中的丰富内涵,不仅探究其历史价值(真)、道德价值(善)、审美价值(美),而且还要发掘其经济价值(利),将真、善、美、利(经济价值)四者兼顾,努力建构真、善、美、利四者结合的价值观与新型的文学观念。

这是一块新的天地,这是一个新的境界。

这是一项颇有意义的研究,也是一个相当艰难的探究。

一、儒商精神的 复兴与中唐诗文革新

研究文学史与理论批评史者论及中唐的诗歌中兴和古文兴盛等背景,往往侧重于政治上的“元和中兴”和文化上的“儒学复兴”,而忽视经济上的改革,尤其是忽视那差不多与经济改革同步的义利观念的演变和儒商精神的复兴。换言之,贞元至长庆年间诗歌中兴、古文兴盛的动因之一,是以白居易、韩愈等为代表的文人义利观念的转变和他们对儒商精神的推进,而他们的义利观与儒商精神又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经济土壤之中。

中唐文人中义利观念的转变与儒商精神的重振

面对着安史之乱后政治混乱、儒学不举、佛老蔓延、风俗颓废的现实,中唐的志士仁人企盼着重振朝政,重振儒学,所谓“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①。此时复兴儒学、攘斥佛老的思想,最为集中地体现在韩愈的《原道》一文之中:

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

^①《旧唐书》卷160《韩愈传》,第4203页,中华书局,1975年。

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①

对于危害仁义的佛老，韩愈猛烈地抨击，宣称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即使僧道还俗为民，烧毁宣扬佛老学说的书籍，将寺庙改建成民用的庐舍，这符合当时李唐王朝的利益，也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然而，论者往往只看到韩愈攘斥佛老的目的是重振儒学，弘扬仁义，而忽视其动机的另一个方面——重农重商，富国利民：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②

“为民者四”，指士、农、工、商。“为民者六”，即四民再加僧、道。“古之教者处其一”，指士，实即指儒士。“今之教者处其三”，指道教、佛教与儒家并列。韩愈在排斥佛老、复兴儒学中既讲仁义，又讲财利，合仁义与财利而言之。正是由于他将仁义与财利并举，所以他把商贾与士、农、工并列，重士、重农、重工又重商，强调“四民”“相生养之道”。当然，韩愈将士、农、工、商等“四民”并重，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重建与维护李唐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秩序，要求农、工、商“出粟米麻丝、作器

^①《原道》，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第13—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②《原道》，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第15—16页。

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也是韩愈在《原道》中所说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应该说,韩愈在《原道》中所提倡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其中承前启后、转旧为新的关键点有二:一是仁义与财利并举;二是士农工商并重又融合“仁与义”、“通货财”的儒商精神。论其“承前”,可以追溯到先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诚然,孔子曾经有过轻视财利的言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又说:“见利思义。”^②这是孔子义利观的一个方面,孔子另一个方面又重视求富求利、惠民利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③“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④子贡(端木赐)在拜孔子为师之前经商,是先秦儒商的典型人物。他善于预测行情,及时买卖货物,因而家累千金,富比陶朱。孔子曾经肯定他经商致富的才能:“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臆)则屡中。”^⑤孔子的传道(仁义之道)与子贡的谋利相互结合,相得益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⑥显然,孔子儒学中的义利观有两面性:既有重义轻利的一面;又有求富求利的一面,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将义利结合,相得益彰,乃至不轻视商贾,吸纳与培养子贡这样的儒商。后者是早期儒商精神的雏形,其基本特征是“义以生利,利以平民”^⑦。然而,汉代以后的儒家往往忽视后者而张扬前者,如汉代的董仲舒极力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⑧。这又被后儒引作存义去利、讳言财利的理论根据,并且僵化成传统的信条,影响极深。韩愈的《原道》在义与利、儒与商统一的层面上继承孔子的思想,追求合仁合义之利,重振儒商精神,不仅冲击着那存义去利以及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而且

①《论语·里仁》,刘宝楠著《论语正义》卷5,第82页,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

②《论语·宪问》,刘宝楠著《论语正义》卷17,第308页。

③《论语·述而》刘宝楠著《论语正义》卷8,第140页。

④《论语·尧曰》,刘宝楠著《论语正义》卷23,第417页。

⑤《论语·先进》,刘宝楠著《论语正义》卷14,第248页。

⑥司马迁撰《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8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⑦《左传·成公二年》载孔子言论:“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788页,中华书局,1990年。

⑧班固撰《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524页,中华书局,1992年。

也开启了北宋王安石、苏洵等人“义利、利义相为用”^①以及欧阳修等人主张封建国家“与商贾共利”^②的思想。

韩愈的《原道》之所以成为由存义去利到义利相用、由重农抑商到与商贾共利的一个转折点,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唐时期虽然藩镇战争连绵不断,社会经济只能缓慢地恢复和发展,始终未能重现开元年间的全盛景象,但是,却出现了几次经济改革,旨在克服安史之乱所造成的财政困难。例如代宗朝有刘晏改革漕运,改革盐政和行常平法,在盐政改革中还鼓励商人以绢代钱籴盐。德宗朝宰相杨炎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其中要求居无定处的行商于所在郡县交纳相当于资财十分之一的商税。由于两税法扩大了货币征收范围,商业更见繁荣。加之战争造成农民纷纷破产,被迫舍“本”逐“末”,转化成小商小贩,商业也畸形地发展。京师长安商贾云集,城中两市店铺栉比鳞次,数量大增,如会昌年间长安失火,延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扬州是南北交通枢纽,麇集大量的客商。成都是西南一带重要商业城市,与扬州处在差不多的地位,时称“扬一益二”。苏州也是商坊热闹的城市,白居易诗中云:“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③正是在中唐时期商业经济回升并有所发展的背景下,韩愈不仅企盼政治中兴、儒学复兴,而且还追求合仁合义之利,重振儒商精神,其主观意图是重建与维护李唐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秩序,而其客观效果也使士、农、工、商在一定的程度上获利受惠。

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白居易也与韩愈一样,追求合仁合义之利,重振儒商精神。白居易一方面反对背弃仁义而求利,强调“划革弊法,沙汰奸商”^④;另一方面,他在义利观上更为开放,将利视为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

①《利者义之和论》,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卷8,第2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②《通进司上书》,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45,第643页,中华书局,2001年。

③白居易:《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白居易集》卷24,第550页,中华书局,1979年。

④白居易《策林》二十三《议盐法之弊》,《白居易集》卷63,第1318页。

夫人之蚩蚩趋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虽白刃冒焉。^①

然则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非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②

“圣人”好利旨在“利万人”、“富天下”。正是基于这种利民富国的儒家理想，他强调士、农、工商等“四人(民)”的“和钧”：

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轻重；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③

臣闻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钧，非钱不可也。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虽有圣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④

白居易主张以轻重政策调节货币、谷帛、财物之间的价格，调节士、农、工、商等“四民”之间的关系，使“四人(民)之利咸遂”，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显然，他在富国利民的前提下强调发挥商贸的作用，维护商贾的利益，是中唐时期儒商精神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前文已提到孔子的义利观具有两面性。孟子、荀子等从“君子义以为上”^⑤的层次上加以推进，进一步阐发了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思

①白居易《策林》十九《息游堕》，《白居易集》卷63，第1311页。

②白居易《策林》二十二《不夺人利》，《白居易集》卷63，第1316页。

③白居易《策林》十九《息游堕》，《白居易集》卷63，第1311—1312页。

④白居易《策林》二十《平百货之价》，《白居易集》卷63，第1313页。

⑤《论语·阳货》，刘宝楠著《论语正义》卷20，第284页，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

想,而汉代董仲舒则将此推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①的极端。与之相并行的,是有的儒家从“工商众则国贫”^②的观念出发,大力张扬重本(农)抑末(商)的思想。韩愈、白居易追求合仁合义之利,重振儒商精神,是对传统儒学中以义制利、重农轻商观念的转变。同时,他们又汲取了中唐刘晏、陆贽等人经济改革与重视商贸的思想。例如中唐经济改革家刘晏(715—780)在接受理财任务后,就致书宰相元载说:“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③他在行常平法中及时掌握商情,故“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④又如中唐另一位经济改革家陆贽(754—805),认为“士农工商,各有所专”^⑤,又认为商品经济和市场活动基本特点是“趋利”,因而主张“交易往来,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当趋利。”^⑥正是刘晏、陆贽等人经济改革、重视商贸、再现盛世的思想,从一个方面促进了韩愈、白居易等人转变传统的义利观,并推动儒商精神的复兴。

韩愈、白居易等人转变传统的义利观与重振儒商精神,是中唐儒学复兴并且革旧为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这种复兴与转变,从一个方面促进了中唐文学思想的革新与中兴。

儒商精神对中唐文学的渗透

儒商精神对中唐文学的渗透是中唐时期儒商精神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宣扬“百货通流,四人(民)交利”^⑦的思想,在富国利民的前提下

①班固撰《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524页,中华书局,1992年。

②《荀子·富国》,王先谦著《荀子集解》卷6,第126页,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

③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23《刘晏传》,第3513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④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49《刘晏传》,第4796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⑤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陆贽集》卷22,第767页,中华书局,2006年。

⑥陆贽《论度支令京兆府折税市草事状》,《陆贽集》卷20,第657页。

⑦白居易《策林》十九《息游堕》,《白居易集》卷63,第1312页。

发挥商贸的作用,维护商贾的利益。这种儒商精神与文学的融合,给中唐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生机,结出一批新的果实,如韩愈的《原道》^①、《送郑尚书序》^②,白居易《策林》中的《息游堕》、《平百货之价》^③、《与回鹘可汗书》^④,元稹的《钱重物轻议》^⑤,刘禹锡的《观市》^⑥,柳宗元的《宋清传》^⑦等散文;又如韩愈的《送郑尚书赴南海》^⑧,白居易的《盐商妇》^⑨,元稹的《估客乐》^⑩,刘禹锡的《贾客词并引》^⑪、《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兼酬拙诗辄著微诚再有长句时蔡戎未殄故见于末篇》^⑫,张籍的《贾客乐》^⑬、《野老歌》^⑭,王建的《寄汴州令狐相公》^⑮、《汴路即事》^⑯,姚合的《庄居野行》^⑰等诗歌,以及李公佐的《谢小娥传》^⑱等小说,或从正面张扬儒商精神,或从反面讽刺、鞭挞那些儒商精神的背离者,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唐时期的道德价值、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

韩愈的《原道》在攘斥佛老中儒商并举,是中唐复兴儒商精神的一篇力作,气势旺盛,浑灏流转,跌宕恣肆,凌厉千古,久已脍炙人口,此处不作多论。此处要较为详细地分析韩愈的《送郑尚书赴南海》^⑲和

①《原道》,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第13—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②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4,第283—285页。

③白居易《策林》,《白居易集》卷63,第1310—1314页。

④《白居易集》卷57,第1224—1225页。

⑤元稹撰《元稹集·外集》卷2,第651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⑥刘禹锡撰,《刘禹锡集》卷20,第247—248页,中华书局,1990年。

⑦柳宗元撰,《柳宗元集》卷17,第471—472页,中华书局,1979年。

⑧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12,第1259页。

⑨《白居易集》卷4,第84页。

⑩元稹撰《元稹集》卷23,第268、269页。

⑪《刘禹锡集》卷21,第262页。

⑫《刘禹锡集》卷35,第518页。

⑬《全唐诗》卷382,第4287页,中华书局,1960年。

⑭《全唐诗》卷382,第4280页。

⑮《全唐诗》卷300,第3406页。

⑯《全唐诗》卷299,第3391页。

⑰《全唐诗》卷498,第5661页。

⑱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卷,第111—1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⑲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12,第1259页。

《送郑尚书序》^①，这是他重振儒商精神的姊妹篇。《送郑尚书序》写于穆宗长庆三年(823)四月，因工部尚书郑权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出任岭南节度使而作。全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写岭南地方官吏循法守礼，不难驾驭；第二部分写“蛮夷悍轻，易怨以变”；第三、四部分写道：

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雨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非有文武威风知大体可畏者，则不幸往往有事。长庆三年四月，以工部尚书郑公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往践其任。郑公尝以节镇襄阳，又帅沧景德棣，历河南尹、华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称道。入朝为金吾将军、散骑常侍、工部侍郎、尚书，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乃是命，朝廷莫不悦，将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诗者，咸相率为诗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韵必以来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来归疾也。^②

韩愈以赞赏之情描写了岭南外贸活跃、外国之货“溢于小国，不可胜用”的局面，并且认为选拔“贵而能贫”、合仁合义的封疆大吏是办好对外贸易的重要条件。对外商贸与仁义道德相结合，便是儒商精神的具体体现。应该说，本文中韩愈对郑权的态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非有文武威风知大体可畏者，则不幸往往有事”等语，反复微讽，意味深长；二是称赞郑权“皆有功德可称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其实，现实生活中的郑权则是名不符实。据《新唐书·郑权传》说：“郑权，汴州开封人。擢进士第……三迁工部尚书。用度豪侈，乃结权幸求镇守，于是检校尚书左仆射、岭南节度使，多哀货珍，使吏

^①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4，第283—285页。

^②《送郑尚书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4，第284—285页。